



六四·三十年 深度

六四专访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1990年，张先玲扫墓，看到儿子的骨灰小盒子有一张纸条：“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

端传媒记者 郑佩珊 发自北京 | 2019-06-04



“你监视我，监视吧。我也不理他，我又不犯法。”张先玲一脸从容不迫，“在恶势下，你只能在环境中找到你生存的方式。对吧？”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监控人员上门，跟张先玲打个招呼，语气谦恭。“唉哟阿姨，我们又来上岗了。你有什么事，给我们打个电话。”

“又来违法了？”张先玲一句回过去。对方客气笑笑，“啊对对，我们违法违法。”

张先玲满头白发，身材瘦小，今年82岁，“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之一。过往多年，她出门有人开车护送，买菜有人跟著提东西，邻居都知道张先玲的经历，不过从来不说什么，只是戏称，这是“首长待遇”。受高度监控的季节由1月17日赵紫阳死忌开始，3月的两会、4月清明节、4月15日胡耀邦忌日..... 临近六四时，监控人员数目增至几十人，有的守住两条主要通道，有的紧盯她家门，有的在院子里拦截纷至沓来的记者。

可故事还是透过网络、透过海外记者，传到世界各地。用张先玲的话说，30年了，她“说了千万遍，全世界的人都听腻了”。她要说的也不复杂——儿子王楠死于1989年6月4日，头部中枪，她要明白死因，知道还有多少人和自己的儿子有相同遭遇。不过尽管在北京的屋子里说了千万遍，声音却传不到屋外去。

有整天“护送”她的年轻小伙子不知事情底蕴，以为自己真的来保护“首长”，防止生人接近。张先玲也不气馁，就在家里为这些小伙子印传单。

“给他们看过真相后，绝大多数人、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人都站在我这边，”她语气坚定，“这些都是我的宣传机会。”

「媽媽你說今天晚上會開槍嗎？」——天安門母親尋覓三十年



他也许以为不会开枪了

北京初春的一个早上，刚刚敲门几下，张先玲就立马开门。她盯著我们，没有问一句话，急道“进来，快进来”。“香港来的？”大门关上之后，她才问。明白了来意，她先邀请记者在客厅准备拍摄工具，再径自步往房间，换下睡衣，穿上上镜的衣服。

年轻时，张先玲是原航天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丈夫王范地是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著名琵琶艺术家。1989年6月3日，面对紧张的局势，王家先后两次讨论局势。儿子王楠当时读高中，很喜欢摄影，不时跑去天安门广场记录学运。一个来串门子的朋友提醒大家要注意，担忧部队或许会开枪，张先玲不太同意。

朋友走了，王楠再问一次：“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

“四人帮的时候都没有开枪，现在都不可能开枪吧。”张先玲不太担心，但她还是提醒儿子千万不要出去。

“妈，你放心，我不出去。别忘了明天出太阳的话，替我把洗的衣服挂到阳台上去！”

这成了母子二人最后的对话。当晚，枪声、救护声响彻小城，王楠住在父母家对面的楼，张先玲远远看到儿子房间的灯还亮著，以为他还家里。



天安门广场西侧的第28中学，曾经埋下王楠尸体的地方，现在已经种下一棵棵灌木。图：受访者提供

第二天清晨6点，张先玲起来发现，灯还是亮的。她跑过去，发现儿子房间里留了一张纸条：“我去找同学，6月3日晚上。”

此后几天，家里一直没有王楠的任何消息。十天后，有电话打来说，找到像王楠的尸体。张先玲跑去医院，同行的学生不忍心她去看尸体，帮张先玲认领。

“就是王楠了。因为他的脖子开过一个刀，有一个疤痕。他穿的衣服鞋子，就是他。”王楠头戴头盔，有绷带包紮过的痕迹，一颗子弹射入他的左前额，从头盔后侧射出。医生对张先玲说，尸体是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第28中学挖回来。

“我很后悔我那句话，可能是我说不会开枪。他也许认为真的不会开枪了。”

过去的事情别再找我了

张先玲自此乌丝全白。最初，她难以入睡也无法食饭，甚至无力下床。“我一直很希望他还是活的。”

可一段时间之后，她想要知道答案：谁救过王楠？包了绷带，但为什么不送到医院呢？为什么尸体给埋了？她说，自己成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逢人就说惨况，坐公车，搭出租车，朋友聚会，任何场合她也不放过。

一个出租者司机告诉张先玲，他看见王楠在南长街南口想要拍照，戒严部队来了，他中弹倒下；群众想要抢救，有老太太跪地求情，但戒严部队不允许，“你们出来，我们就给你打死，他是暴徒”，其时王楠尚有体温。还有见证人也陆续确认这个情况，但没有人敢出来作证。

张先玲又找到一名医科生。1989年，他是北京医科院应届毕业生，6月3日当晚与同学自愿组织医疗队，为群众急救，发现王楠救不了之后，决定收起王楠身上的证件，并写下一份死亡证明书，包括身份、年龄、中弹部位和死亡时间，留在尸体上，后来他们被戒严部队赶走了。

可王楠怎么被埋在第28中学？张先玲继续查找，综合多方消息，拼凑出这样的经过：警察大清晨接到电话，要协助戒严部队打扫现场，把尸体都给埋了；隔了一阵子，尸体发臭，又被挖出来，估计因王楠当时在军训，身穿军服，被误认为军人，才被送到医院去了。最初，她猜测政府慌乱之下才去埋尸，后来又听说，因当年一颗外国卫星将要打开，避免长安街实况给拍下，就得埋掉死去的人。

“这是我连出来的真相。真相到底如何，就是靠当时的人说出来。”

1990年1月，那批曾在广场一带救人的医科生找到张先玲，登门拜访，并归还王楠的遗物，包括他的学生证和钥匙。照相机呢？医科生表示，他们发现王楠的时候就已经不见了。

张先玲记得，其中一名医科生后来还给她发贺年片，现在人还在北大医院工作，不过对于往事，已经不再提起。

“他就说：过去的事情别再找我了。”张先玲说，“他现在态度完全不同了，这也可以理解吧。”



包括张先玲在内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到万安公墓拜祭六四死难者。图：天安门母亲网页

骨灰盒上的小字条

王楠的骨灰存放在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骨灰堂。小小的骨灰盒上，摆放一张遗照，相片上，王楠戴著一副厚镜片眼镜，咧嘴笑得灿烂。

1990年，张先玲去扫墓，发现骨灰小盒子上留了一张纸条：“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纸条上附有姓名、住址和所在单位的电话。

写字的人是尤维洁。6月4日凌晨，她的丈夫杨明湖听到外面有枪声，说要出去看看。在南池子东长安街的路口，杨明湖中弹了，膀胱被炸成几片，骨盘是粉碎式骨折，撑了两天后离世，遗下5岁的儿子。

王楠的骨灰盒就在杨明湖的后两排，尤维洁发现了这一位死于6月4日的年轻人，就萌生了认识对方家属的想法。

张先玲看著纸条的电话，拨给了尤维洁，邀请对方见面，后来又把字条给了更早就认识的另一位母亲丁子霖看。

丁子霖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儿子蒋捷连生于1972年6月2日。1989年6月3日晚上约11点，蒋捷连在木樨地遇难，后背左侧中弹，穿胸而过，击中心脏，遇难时刚满17岁，仍是一名高中生。

看到纸条，丁子霖写了一封信，把整个家里的情况都告诉了尤维洁。一纸一信一个电话，依托著共同经历的悲剧和信任，三个家庭开始聚在一起。

寻访死难者的原则：说谎

六四之后，国内气氛一片肃穆高压。张先玲记得，时任国家总理李鹏回应事件，形容家属觉得事情不好看，故不让政府公布死难者名单。

张先玲听了心里不忿，第二天就去找住在附近的丁子霖，商量要找被枪杀的中学生。

丁子霖的丈夫蒋培坤，同样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他建议查找范围不应该局限在中学生。

“要找就都找。找的目的是什么？证据吧。你不是说就死了一个人嘛，我们给你找出来，死了几个人？”

大家决意行动。丁子霖和蒋培坤成了主将，两人在大学任教，认识很多学生，找人方便，同时也会接触媒体，联系国际组织，述说惨案。

1994年首次正式出版名单，整理了52名死难者的信息，由香港杂志《九十年代》代为印刷，名为《“六四”死难者名册》，当中详列丁子霖的住址和电话，还标明与外界有联系。



天安门母亲多年来搜集一份逾200人的死难者名单，过程不容易，丁子霖早年已接受外媒采访，常被监控，寸步难行。摄：Peter Parks/AFP/Getty Images

不过，公开露面之后，丁子霖夫妇二人很快便遭到惩罚，丁子霖的教职被“暂停”，中央宣传部发出内部通知，禁止二人出版学术著作或在报章发文章，其名字也不准出现。

已经离开航天工业部的张先玲没有工作，开始承担了更多的寻访工作。直到今天，天安门母亲搜集了一份有逾202人的死难者名单，过程不容易。

“一个原则，就是说谎，你不说谎，你找不成啊。”张先玲这样总结她的调查心法。

掌握死难者姓名、居住地点等情报之后，张先玲挑一个不太惹人注目的晚上前往探访。有一回目的地是公安部宿舍，还有老奶奶在门外值班，张先玲就说：“我刚去了一个旅行团，团友认识住在里头的一个朋友，据知他生病了，就托我带了东西去他家慰问一下。”

一头银发的老人家很少惹人怀疑，十之八九能够蒙混过关。不过，如果手头上的资料不一定齐全准确，例如地址只是一个院子，未有点明单位，只知道死难者的姓氏，不得其名；张先玲曾到达现场后，才发现胡同不存在，院子给拆了，变成空地。

张先玲这时会使出同样的招数，但会在对话添加情节，以取得更多信息。“团友交给我点心，让我带给这个胡同、姓杨的，他还写了一封信，可是我搞丢了……只记得胡同，号码、人名都记不住了。点心摆著，时间长会坏，你会知道吗？”

人家看她这么大岁数，也就相信了，张先玲再下一城，“听说他家的儿子去世了”。对方一听就回应：“怎么死的？”她就装傻，“那我不知道，不就病死，还能怎么死？”被问的不虞有诈，和盘托出。“那边有一个姓杨的，还未拆掉，他六四时被打死了。”

直到最后面对难属时，她才会拿出儿子王楠的照片。

校 名		北京市月坛中学			
姓 名	王楠				
住 址	北京紫竹院路2号				
性 别	男				
出 生					
年 月	(像片处加盖校印)				
签 发	89				
日 期					
编 号					
年 度	学 期	年 级	班 次	负责人	
88 89	二	高	2		

王楠的学生证。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曾经有一次，寻访小队得知难属姓名，但对方电话改了，地址也不对。张先玲主动出击，打去对方的工作单位。“我是某某的同学，他搬家了，能否给我地址？”结果只能取得当事人电话，她之后又打过去，讹称自己是某个机构的工作人员，说这家人的登记不清楚，要求拿个准确的地址。

“我是诈骗电话的鼻祖。”张先玲笑说。

不过，不是每一位难属都积极回应张先玲。许多难属道出了经历，成了天安门母亲的成员，也有的坚定回绝任何会面。

有难属曾经问张先玲，这样寻访，有什么意义？

“我在寻求证据，我在核对真相，总有一天有用。”这位母亲回答。

一伙人在一起

这几位母亲一边寻访，一边邀请难属加入群体。定下的机制是签名了就是成员，多年来，未曾有一人退出。成员当中，除了母亲，还有父亲，有遇难者的兄弟姐妹和孩子，还有因六四而致残者。

他们曾撰写起诉书控告李鹏，多年未获回应。2000年时，这一群人為自己取名为“天安门母亲”，最高峰时，成员人数达190人。

记者问道，当初没想过变成这样的组织吧？张先玲小心翼翼地强调说，“在国内是禁止搞组织的，组织会要取缔，所以我们也不是组织。只是群体，一伙人在一起。”

措辞谨慎，皆因这些年来，家属一直受压，至今也没法公开悼念亲人的离去，六四当天还得坐当局专车，才能去墓园拜祭；也曾经有难属说，把孩子的骨灰撒了在北海公园的湖里，以后家人每次去公园，便是去看孩子。

30年过去了，难属老的老，死的死。

现时，“天安门母亲”中，56人已先后离世，只剩下126名成员。早在2013年，丁子霖收到一个其他难属发来的短讯说：“我们都老了，应该想一想后面，六四的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后面是不是有人应该要继续做。”丁子霖找来了从第一批已经加入的尤维洁和几个难属接棒，组了个服务团队。

2014年，六四二十五周年，尤维洁由过往在幕后“普通的难属”，正式变成媒体常常联络的“发言人”，起初，她并不习惯，当时家门楼下总有人，走到哪，跟到哪，面对媒体，她也手足无措。



2014年，六四二十五周年，尤维洁由过往在幕后“普通的难属”，正式变成媒体常常联络的“发言人”。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不过，时间逼著她不断往前走。2015年9月，蒋培坤因心脏病发离世，女儿在3个月后因癌症而跟著走，丁子霖在三个月内失去两名挚亲。现在，82岁的丁子霖近年卧病在床，已经难以接受传媒访问。

尤维洁的工作近年越来越重。“把我迫上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退，就迫著我走。”

六四二十五周年时，她曾去探访四散在中国各地的难属。六四三十周年前夕，她在Facebook上开通了帐号“**Weijie You**”，先加一批媒体记者为朋友，随后上载多段由其自行制作的访问影片，邀请大家“共同分享来自于当年失去亲人的难属们讲述的痛苦”，相关片段同在天安门母亲的官方网站公布。

这些自述影片中，每名亲属只有短短几分钟，诉说家人离开的心情。其中大学生刘洪涛的妈妈齐国香是退休大学讲师，她一开始说话，便泣不成声。30年来，她和丈夫只能在屋内悼念儿子。

“我们也没有公开为你悼念过，请你原谅，因为你的骨灰没有地方放，把你放到床下了。爸爸妈妈死后也要和你会合，好好陪伴你。”那双握著蜡烛的手，一直在抖。

片段的末尾，齐国香说：“我们的国家会一天比一天好，孩子你放心吧。”

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怎么不来利用我们？

2019年6月2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亚洲安全峰会上，回应传媒提问时罕有就六四事件表态，形容这是“一场政治风波、一场政治动乱”，当时中央及军队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平息动乱，才令国家保持稳定，是“正确策略”。

“说了30年，都是这一套。”张先玲冷笑，回应说：“一个国家只能用枪弹来打死老百姓，用国防军来杀死手无寸铁的平民，才能维持国家正常的运转，那这还是个国家吗？这不是个土匪群？”

尽管行程被紧盯，通讯遭监控，但张先玲相信，“天安门母亲”日复一日的工作亦然有效，至少她发现，身边至少监控者的态度也有改变。

她形容对方以前的态度特别狠：“为什么要出去？出去要跟我报告！”张先玲会骂回去：“我是罪犯吗？我被管制了吗？你们才是犯法的呢！”

吵了不知多少回，张先玲继续自己的生活，他们继续在家门外守著。

“你们脑袋进水了，半夜三更还在看。”对方回道，“不是我们脑袋进水，是我们上头的人脑袋进水。”张先玲也明白，“他们监控我们，也不是底下人愿意。说实在话，天气那么冷，在那儿坐著，谁愿意啊？”

近年，张先玲身边的人换上保安公司的年轻人，完全不知道他们奉命保护的人是谁。“领导说要我们保护你，不要让生人接近你……你可能是首长吧。”

六四25周年之时，院子来了几十人，张先玲就在家里印了几十份材料，发给他们看。“有些人不敢表示出来，但内心也站在我这边”；也有人要求张先玲答应不见记者，那就撤掉监控，她一口拒绝。

保安人员说：“他们利用你。”张先玲直白回应：“我喜欢被他们利用，他们利用我们，我们的话就传出去了。”她反问：“你们怎么不来利用我们？你可以用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来利用我们呢！”





张先玲早上七、八点起床左右，会先在家中摆放王楠的照片上一柱香。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凄凄惨惨，那我们怎么斗争？

30年来，张先玲的生活大多围绕著六四和不幸遇难的儿子，她早期主力寻访，近年才慢慢把担子交给稍为年轻的难属。

朋友劝她说，不要搞了，还是好好保重身体。张先玲认真地说，“你以为我每天都很悲惨？不是的。想到这事，当然不高兴，但我不是悲苦那种人。该高兴还是会高兴，该玩还是玩，该出去还是出去。”

这些年来，她去过欧美亚洲各地，也踏足过南非，名单只欠澳大利亚，最近还去了一趟潮州走过湘子桥，吃到肚子撑撑的回来。“不可能很苦，很苦我们怎能活下去啊？凄凄惨惨的，那我们怎么斗争啊？”

惟前年年底，老伴王范地离世，她的精神开始大不如前。家里客厅、睡房都有二人合照，桌子上的记事小本子由丈夫过去的药单改造而成，还有两台他用过的手机。王范地工作忙碌，但总是支持张先玲的工作。

面对丈夫的琵琶，张先玲只会听，不会弹。老伴生前留下了20多万字关于琵琶的书稿，这段日子她就待他的学生前来，一同看看稿子，打发日子。

其余的时间，张先玲过著自律的日子。她睡前看看书，早上七点多起床，先给家中王楠的遗像上一柱香，白天一个人做饭，搞卫生，洗衣服，有时会去附近饭堂点一个菜，吃一尾鱼，提醒自己保持饮食均衡；闲时还会用社交帐号找朋友聊天，那个帐号名字里头，藏著儿子王楠出生的年份。

早阵子，北京天气好，她就搭地铁，去逛逛颐和园。家里的大门上贴著一张纸条，上写“水、煤、窗”，提醒年过八十的自己出远门要注意。

张先玲强调说，难属们生活上还可以。她握着我们的手说，“这个事情不会忘记，精神上的痛苦，永远跑不了，是不是？相比如果没有（六四）这种事情，我们活得更好。”

尤维洁记得，20多年前，她和张先玲、丁子霖刚相识不久，三人就曾许下一个至今不知是否能实现的愿望：“如果六四的问题能够解决的话，我们相聚在天安门广场，为这些死去的人献花。”

六四周年

六四30年

天安门母亲



热门头条

1. 华为总裁任正非就美国禁令答记者问
2. 何边书：中美科技战，时代不站在华为和任正非一边
3. 关键合作方“断供”，华为真的准备好了么？
4. 边缘化的六四论述：八九春夏，其实发生的是“两场运动”
5. “我当时，可能真是做对了一件事”——那个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湾记者们(上)
6.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7. 华尔街日报：华为崛起之路伴随着剽窃与不正当竞争指控
8. 半生被称刽子手，戒严部队军官：“我也是六四受害者”
9. 被围困的六四论述，需与后冷战的时代光谱重新对接
10. 影像：台湾同婚合法日，超过500对同志伴侣登记成婚

编辑推荐

1.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2. “北京公社”的八个瞬间（下）：以“无政府主义”视角重构六四
3. 专访前四通总裁万润南：三十年来血仍未冷，格局变化将带来新局面
4. 专访王超华：我不是秋瑾，我是你们的一分子
5. 请回答1989：支援与裂缝，那一年，香港学生在北京
6. 专访裴敏欣：中国或通过改良式革命转型，挑战将来自中共内部
7. 從北京警察到六四抗暴者：他牽着兩歲女兒，目睹世界翻轉

8. “寻衅滋事”式纪念，陈云飞“快乐抗争”的心法

9. 六四报导在香港：抵抗时间流逝、采访管控和中央划线

10. 2019年戛纳影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虚幻的满足感：电影产业还强盛地活着

延伸阅读

709律师妻子的1000天：走不完的寻夫路

709被捕失踪律师的妻子们，经历了国家的软禁、威胁和打压，在寻找丈夫的途中，她们期许自己不再只是“政治犯的妻子”，更成长为公民、自我觉醒的美丽女人。

互动页面：工人、师生、母亲、记者——9个人的广场记忆

一切变得模糊之前，端传媒走访多地，以声音和影像留住一片记忆的虚拟场所。

一个人的战斗，没有退路的吴仁华

吴仁华三本书最初都在香港自费出版，封面是自己用 word 文档设计，“很难看、很粗糙”。“三十年过去了，你出版那些受害者名录，谁会买呢？”

“寻衅滋事”式纪念，陈云飞“快乐抗争”的心法

“公权力就是猛兽，我们目的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陈云飞就是驯兽师。

请回答1989：支援与裂缝，那一年，香港学生在北京

她感觉，八九之后，“国家把你关在外面了，不让你接近”，而香港慢慢成了她真正的家，“我要守护这里（香港），就像我守护北京一样。”